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 张培刚

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 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 和私有化

陈鸿仪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张培刚

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 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 和私有化

陈鸿仪 著

F279.243
Ch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

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和私有化/陈鸿仪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

ISBN 7-5609-3151-0

I. 中...

II. 陈...

III. 乡镇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IV. F279.243

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

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和私有化

陈鸿仪 著

责任编辑:李琼

封面设计:潘群

责任校对:周娟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排:华大数码设计室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173 000

版次:2005年2月第1版

印次: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80元

ISBN 7-5609-3151-0/F·273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张培刚

副总主编：夏振坤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齐云 汪小勤 宋德勇

张卫东 张建华 徐长生

英文版自序

1999年秋，当我终于完成本书英文版最后一页的那晚，我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饭。我点了几样菜，慢慢品尝，以示小小的庆祝。饭后打开“幸运签饼”时，一张小纸片出现在眼前。上面写道：“永远保持对以往的回忆，永远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永远保持对以往的回忆，永远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我究竟有多少对以往的回忆？我又有对未来的希望？我的眼里充满了热泪。

我出生于中国上海。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像那时所有的中国少年一样，相信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我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少年一样，对明天充满了美丽的梦想。然而，“文化大革命”将我所有的梦想击得粉碎。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被下放到黑龙江边的一个小村插队落户。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在那个山村生活和劳作了整整八年之后，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中国农村：终年的饥肠辘辘，有限的口粮根本不够果腹，更何况我们年轻的身体正在发育；冰天雪地的冬夜，瑟缩难忍刺骨的严寒，没有取暖的燃料；暴风雨的夏夜，枯坐在屋脊之下欲哭无泪，因为简陋的茅草房无处不在漏雨……渐渐地，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形成：如果一个制度不能让生活住在其中的人民过上一种至少是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能够说它是“最完美的”制度吗？

就是由于有了这个疑问，1977年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上海并进入复旦大学求学时，我放弃了从小深爱的中国文学，而选择了经济学作为我的专业。我急于探寻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急于学习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改善近十亿普通中国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已与他们血

肉相连,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在两年枯燥的政治经济学学习之后,我决定跳过余下的本科课程,直接报考硕士研究生。(感谢当时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张薰华教授,他不仅允许,事实上是他鼓励我做出了这一决定。)作为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生,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我寻找答案的道路上开阔了我的眼界。我懂得了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如何将资源配置到它们最有效率的用途上去,以及这一体制如何在过去的那个世纪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一场经济改革。而十分幸运的是,中国正是此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改天换地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主讲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相信这是我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做出贡献的最佳途径。然而,渐渐地我又感到迷茫起来。因为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传统的经济理论似乎无法应用于我们在转型中的中国所观察到的现象。它们也不能为现实改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我的新一轮的探索引导我于1990年来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在这所著名的学府里,我有幸师从数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如 Irma Adelman 教授、Sherman Robinson 教授、Oliver Williamson 教授、Pranab Bardhan 教授等。我逐渐地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充实了我的知识。这使我有机会从新的角度和高度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当我进入博士学位的最后学习阶段时,我选择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为我的学位论文的主题。这一选择得到了我的论文导师 Brian Wright 教授和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 Irma Adelman 教授以及 Thomas Gold 教授的全力支持。本书就是在该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它是我在过去二十年中孜孜探寻的结果,同时我也希望它能成为我对我深爱的祖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我衷心地希望经济改革能使勤劳的中国人民最终摆脱贫困,享受他们应有的繁荣与富足。

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发展成果辉煌,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却经常被其在政治改革上的缓慢进程所掩盖。在西方学术界,有关转型经济学的文献时常忽略中国的经验。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没有遵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早期即采取迅速私有化的典型的改革方针。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转型经济却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并导致远超过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范围的辩论。这种关注因中国明显成功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向自由市场体制和产权改革的不断进展而得以加强。因为中国并未遵从西方学者所建议的经济改革的“确定途径”,她的成功经验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转型经济与东欧和前苏联各国是如此天差地别的表现?中国具有怎样的特殊条件,使她能够采用看似行不通的改革战略,却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果?中国的成功对有关东欧转型经济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们,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本书即为其中之一。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放权”,即中央政府减少对微观管理体制的行政控制,并允许基层单位分享部分新创造出来的利润,以此改善微观的动力机制和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机制随后也进行了改革,以满足基层单位对于一个公平和更具竞争性的经营环境的要求。自由的市场逐渐成型。中国与东欧诸国的改革之间的不同,在于中国宏观政策环境,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滞后。由于私有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禁忌,中央政府对于私有化一直犹疑不前。中国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从基层一级发起的。“放权”以后的决策过程和基层单位不断增加的自主权造成了企业管理组织的变化。与此同时,市场体系的发展又加强了这种组织变化。这种变化积累起来,最终造成了产权结构的根本性改革。因此,产权改革在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由内生力量所推动的、由下而上的过程,而不是由外在的政策设计所驱动的、由上而下的

过程。正是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使中国的基层单位成为产权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原动力。由大多数民众所推动和支持的经济改革是不能逆转的。

本书以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例,阐明产权改革如何经由企业契约形式创新而得以实现。我的整个研究是以1994年我在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在1998年冬所进行的追踪调查为基础的。本书第一章简介中国乡镇企业部门的发展。随后的第二章转而讨论中国乡村的社区组织,以及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这一章也解释了集体乡镇企业的社区公有制为何在一个转型经济中既优于国家公有制,又优于私人所有制。第三章详细介绍乡镇企业部门所采用的各类契约形式,以及在过去十余年中它们的演进过程及变化。第四、五两章应用理论分析以探究哪些因素决定企业契约形式的选择和契约结构的演变。模型模拟和假说检验显示,市场体系的发展和企业的技术结构是企业契约形式选择和创新的决定因素。最后一章介绍内生的经济改革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企业契约形式创新在将中央政府的市场自由化的局部性改革转化为对产权的根本性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产权改革最终将有助于完成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在修改本书的手稿时,我曾考虑删去原稿第二章中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组织和集体乡镇企业产权结构的部分,因为它与本书的主题——企业契约形式创新——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但我论文指导老师Brian Wright教授的建议下,我仍保留了这一部分。如他所指出的,本书读者,尤其是西方的研究者,可能对中国的乡村组织缺乏了解。这一部分可作为背景材料,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经济改革据以发展的制度环境。

三

我衷心感谢戴维斯加州大学的Scott Rozelle教授。是他以他在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的经验激励并从头至尾地帮助我完成了这一研究。可以说,没有他在研究题目选定、实地调查、分析方法设计和

材料取舍诸方面慷慨而细致的指点,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

我从伯克利加州大学极其艰难但催人奋进的博士课程中,获益匪浅。我更从该校农业和资源经济系声名卓著的教授们,如Irma Adelman, Brian Wright, Sylvia Lane, George Judge, David Zilberman, Alain de Janvry, Elisabeth Sadoulet 等,学得丰厚的知识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他们对我的鼓励,对我研究所作的评论和所提的建议,对于本研究的完成实在有无法以语言来评说的价值。

我也从我在几个研讨会和学术讨论中认识的学者与朋友那里得到不少评论、批评与建议。在此我要向以下各位致以感谢: Margaret Maurer-Fazio, 钱颖一, 车嘉华, Jean Oi, Albert Park, Michel Oksenberg, Kejiro Otsuka, 金和辉, Nobuhiko Fuwa, 赵金华, Susan Whiting, Vernon Ruttan, Bruce Reynolds, 萧政, 林毅夫, 文贯中以及 Stewart Long。

我十分感谢Brandeis 大学的Gary Jefferson 教授。他在读了我的论文原稿后建议我将其修改出版,并将手稿推荐给了Ashgate 出版社。他的指点帮助我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追踪调查,从而有效地更新了本书所提供的信息。我的朋友,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韵娟女士,帮助我进行英文润饰,使之更为流畅易读,对此我深表谢意。Ashgate 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将我的手稿转变为可出版的著作上做了耐心而细致的工作,在此我一并致谢。当然,作为著者,我对本书所表述的观点以及书中的错误负有全责。

我最特殊的感谢,要献给以学识和人品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两位中国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的宋承先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正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的学术环境中,指导我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并鼓励我将农村改造与经济发展问题作为我的研究领域。宋承先教授已于1999年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我无法描述我深切的悲戚和悼念。

我还要感谢那些我在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时访问交谈的政

中文版自序

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张培刚教授即与我联系,希望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并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Ashgate出版社商定了版权转让协议。由于这一安排,本书得以与更多的中国读者见面,并可因此得到国内同行们的批评指正。为此,我对张老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深表谢意!

我对本书要说的话已全部坦陈于英文版序言之中。在此我只想再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为经济学的应用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真正的经济学应是根植于对日常经济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之中,并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作为惟一宗旨。我愿为此奉献终身。

在将原书译为中文时,我对书中的宏观数据作了尽可能的更新。因为我原有样本中的不少企业已转制为私有企业,所以我们已无法取得与原研究口径一致的数据。我未能在完成中文稿前再次进行追踪调查,确是一大遗憾。

作者 2002 年 8 月于美国加州伯克利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乡镇企业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组织结构及本书研究重点	(5)
第三节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13)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	(17)
第二章 地方政府领导、企业经理和集体乡镇企业的	
两层产权结构	(20)
第一节 地方领导在乡村组织中的双重角色	(23)
第二节 地方领导人的目标和动机	(25)
一、目标	(26)
二、动机	(29)
第三节 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	(38)
一、产权理论	(39)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41)
三、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	(44)
第四节 地方领导作为集体乡镇企业实际所有者的优势	(48)
一、保障产权	(49)
二、提供资源	(51)
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吸纳	(62)
第五节 作为地方社区政府代理人的乡镇企业经理	(67)
一、控制权从社区政府向企业经理的再委托	(67)
二、乡镇企业经理人员的构成	(69)

三、集体乡镇企业的管理方式·····	(71)
第三章 集体乡镇企业的契约形式·····	(78)
第一节 集体乡镇企业所采用的契约形式·····	(79)
一、工分制·····	(80)
二、工资制·····	(80)
三、集体承包责任制·····	(83)
四、个人承包责任制·····	(85)
五、租赁·····	(89)
六、拍卖·····	(91)
第二节 股份合作制·····	(93)
第三节 管理契约形式的三种类型·····	(97)
第四节 集体乡镇企业契约结构的共存、演变 和跨地区变动·····	(102)
第四章 集体乡镇企业契约结构模型·····	(112)
第一节 制度和导致的制度创新:制度经济学 的简短回顾·····	(112)
一、制度和制度经济学·····	(112)
二、治理的制度·····	(115)
三、交易成本为正时的缔约·····	(118)
四、治理结构和交易成本·····	(120)
五、导致的制度创新·····	(123)
第二节 可能决定乡镇企业的契约形式的因素·····	(128)
第三节 模型·····	(139)
第四节 模型的模拟及其含义·····	(144)
一、占主导地位的契约形式的空间分割·····	(146)
二、企业技术结构的差异·····	(150)
三、外部经营相对重要性的变动·····	(152)
四、机会收入的变化·····	(154)
第五章 对集体乡镇企业契约形式创新的解释·····	(158)

第一节 模型的实证检验:模型预示因素的解釋能力 …	(158)
一、市场的发展	(159)
二、企业的技术结构	(163)
三、地方经济环境	(168)
第二节 模型实证检验:模型预示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170)
一、模型与变量	(170)
二、数据	(176)
三、分析结果与解释	(178)
四、结论	(186)
第六章 结论:内生改革与导致的私有化	(189)
第一节 导言	(189)
第二节 内生的经济改革模型:“导致的私有化”	(193)
第三节 契约形式创新的反馈效应	(199)
第四节 我们可从中学到什么	(211)
第五节 后记	(217)
一、固定缴付型契约的扩散	(217)
二、浙江调查点的停滞	(220)
三、私有化趋向	(220)
四、固定工资管理形式的持续存在	(221)
五、结论	(222)
参考书目	(225)

第一章 导 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论是在中国国内或是国外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里,“乡镇企业”已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中国自进行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每年增长率接近10%),12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成就斐然,举世瞩目。有些学者将之称为“中国奇迹”,无人可以忽略这一成就。同样地,无人可以忽略中国的乡镇企业部门以及这一部门对中国的高速增长所做出的不可抹杀的贡献。

中国的乡镇企业并非由中央政府所主导或设计,而是如雨后春笋,勃发于农村基层社区。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甚至并未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由于惟恐乡镇企业会成为与国有企业争夺资源与市场的对手,中央政府最初曾试图限制其发展,直至认识到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后,中央政府才转而采取支持态度,不过仍持明显的保留态度。甚至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仍未充分认识到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最迅速的部分。邓小平在1987年曾说:“……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成果是乡镇企业的发展”⁽¹⁾。这表明他承认乡镇企业部门的发展并非出自中央政府的主观意图,而其辉煌成就也完全超出了中央政府的预期。

由于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组织形式极其错综复杂,因而很少有研究者能对其有真正透彻的了解。对很多研究乡镇企业的人来说,一个既无明确界定的产权,又不受政府发展战略所支持的部门却在一个进行改革的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们都竭尽全力,试图发现有效的研究方法或工具来解开这一“难解之谜”。本书

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综合性的、首尾一致的分析,以解答什么是乡镇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该部门怎么会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主导力量的问题。

作为全书的引言,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简短回顾乡镇企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节综述本书的研究重心,说明如何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主要概念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契约形式结构,以及这一结构的演化与变动。第三节简介研究的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最后一节是对全书的一个简短综述。

第一节 乡镇企业及其在中国经济 增长中的作用

中国的乡镇企业部门由四类企业构成: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农村联户企业和个体企业⁽²⁾。该部门在过去20年间以近30%的年增长率增长,而在1990年至1994年期间,其年增长率更高达45%⁽³⁾。在1999年,该部门拥有2 071万家企业,12 704万名雇员。其总产值达108 426亿元⁽⁴⁾。同年该部门的工业总产值为76 700亿元⁽⁵⁾。

乡镇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而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表1.1可见,在1978年,乡镇企业部门仅雇用了9.2%的农村劳力,为全国总就业人数的7%,然而到1995年,该部门已雇用了28.6%的农村劳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18.9%⁽⁶⁾。乡镇企业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在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不到10%。仅仅17年之后的1995年,该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6%。同样地,该部门在1978年所提供的税收仅占全国总税收的4.2%,而在1995年,这一比例已高达21.6%。

自1978年开始农村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这一增长不仅是承包责任制取代公社制的结果,更是

表 1.1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乡镇企业数目/百万家	1.5	1.4	12.2	18.5	22.0
乡镇企业雇员数/百万人	28.3	30.0	69.8	92.7	128.6
乡镇企业雇员占农村劳力的比重/(%)	9.2	9.4	18.8	22.1	28.6
乡镇企业雇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	7.0	7.1	14.0	16.3	18.9
总产值/亿元	495	665	2 755	9 581	68 915
工业总产值/亿元	385*	509*	1 827	6 050	51 259
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9.1	9.9	18.8	25.3	55.8
缴付税款/亿元	22	26	137	392	1 302
乡镇企业缴付税款占全国总税收的比重/(%)	4.2	4.5	6.7	13.9	21.6

* 仅限于乡办和村办企业工业产值。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0 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1—2000 年；马戎等人主编《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调查》，1994 年，第 7 页。

迅速扩张的非农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农村企业发展的结果。根据中国农业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4 年)的报告，在 1993 年，64% 的农村人均净收入的增长来自乡镇企业。表 1.2 说明农户收入来源。在 1978 年，每一农村居民平均每年只从非农企业挣得 3 元的劳动收入，大约为其年总劳动收入的 3.4%，净收入的 2.3%。与此相比，在 1996 年，每一农村居民平均从企业挣得 311.5 元的劳动收入，占其总劳动收入的 69.1%，净收入的 16.2%。如果我们视农户非农业经营为企业类型的收入来源，则农户得自非农经营与企业劳动的总收入在农户净收入中所占比例从 1978 年的 6.1% 上升到 1995 年的 28.6%。因此，不论是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产出、就业以及税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还是其对改善农村收入所做出的贡献，都不应被忽视。在没有中央政府的主导或鼓励